

教育部 97 年度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性別、都市與文化】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宗儀

執行期程：98.02.01-98.07.31

日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

# 目 次

一、 計畫總表.....	2
二、 導讀.....	3
三、 議題探討結論.....	10
四、 研讀成果.....	18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32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33
七、 經費運用情形.....	33
八、 改進建議.....	33

## 二、導讀

演講者	台大城鄉所畢恆達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2-25
講題	從女性專用車廂看空間的性別區隔
演講摘要	<p>2006年6月1日台灣鐵路局在因應幾位女性立委與婦女團體代表的提議下，為防治性騷擾，於通勤的電聯車試辦「女性專用車廂」，後由於婦女團體意見不一致、男性團體投訴反對，以及實際執行困難的情形下，於11月底試辦期滿後喊停。</p> <p>試辦期間，固然由於事前規劃不夠詳盡，以致於執行困難重重（例如宣導不足、指示標誌不清楚、沒有罰則等），更值得玩味的是，保守的男權主義者與批判的女性主義者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女性車廂，立論基礎卻南轅北轍。女性主義陣營內對專用車廂也出現不一致的看法：大家共同的目標在於防治進而消除性騷擾，但是設置女性專用車廂這種空間隔離的策略，究竟是邁向性別平等的階段性策略，還是阻礙性別平等的機制，則仍有很大的辯論空間。</p> <p>本演講要大家思考的是，基於怎樣的理由，才能夠支持空間的性別區隔。女性專用車廂，是一個「女性意識揚昇的空間」？是一種「婦女保障名額」？還是是一個放大版的「博愛座」？女性專用車廂的概念能否推廣到游泳池的女性專用水道或女性專用時段？女性專用車廂和女廁、女校、女性三溫暖的異同為何？空間的性別區隔又會帶來怎樣的（非意欲）後果？</p> <p>講者簡介： 畢恆達教授，台大土木系/研究所畢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研究所博士。現任台大城鄉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有環境心理學、性別與空間、質性研究、街頭塗鴉。著有「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GQ男人在發燒」等書。</p>

演講者	東海社會所張正霖博士
演講日期	2009-03-18
講題	中國當代藝術內的性別再現與都市奇觀
演講摘要	<p>中國當代藝術的創作、論述、傳播，是在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脈絡中產生的，或者說，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脈動密切相關。從某種研究意義上說，此一新的社會脈動固然複雜多元，</p>

但仍具有一可能的觀察軸線，即新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的構造過程，其中包含了都市化、消費化、世俗化與感官化等範疇，並且頗為突顯地凝聚在一都市現代性想像的框架之中，此處，我將之稱為文化霸權的都市奇觀化。固然，集體的意識形態與藝術作品之間，其意義層次的連繫，並非直接及反映性質的，但仍可能存在一再現性的關聯模式。在我的研究中，即發現到，在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性作品內，與上述奇觀化的都市想像間，存在一相應的女性形象的美學系譜，此處，女性形象成爲了新的治理邏輯與象徵秩序的視覺隱喻，其中，從女體的重性別化起，到新時期「女性特質」的再現，進之衍生出如母性化、情慾化、色情化、商品化、消費化、厭女，乃至於「白人女性形象」的象徵意義等面向，並與當代中國的性別敘事轉變關係密切，強化了女性既有的性別從屬角色。簡言之，在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與都市奇觀的地景之中，女性的身形，成爲了新國體的最佳喻意，而此一視覺藝術與性別研究的主題，構成本次演講的核心關切之處，等待我們一同做深入的思考，和理論概念上的相互激盪。

講者簡介：

張正霖博士，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研究所肄業、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美術碩士、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英國愛丁堡大學亞洲研究學院博士研究，曾任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研究員。研究專長爲藝術社會史、台灣美術史、中國當代藝術、紀實與實驗影像、視覺藝術與性別研究等領域。

演講者	台師大翻譯所李根芳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4-01
講題	熱與塵——戈壁沙漠的傳教三姊妹
演講摘要	由於旅行往往代表著冒險與探索未知，因此過去絕大多數的旅行書寫均爲男性作家的作品，隨著交通日益發達，女性意識逐漸提昇，女性旅行書寫也漸成氣候。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蓋博與法蘭屈姊妹一行三人以傳教爲職志，選擇到中國內陸的戈壁沙漠傳福音，她們創下許多女性沙漠旅者的第一記錄，其作品不僅在當時傳頌一時，並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第一手當地的史地人文資料，啓發後世研究及探險者的興趣。以這幾位女性旅者橫越沙漠的遊記做爲研究分析對象，探究爲什麼這些女性會選擇氣候嚴酷，地理環境艱險的沙漠爲目的地，這些女性旅者的遊記和男性沙漠旅者的遊記又有什麼不同？如果征服沙漠代表的陽剛氣質的

	<p>展現，這些女性旅者是否只是複製了男性旅者的探索精神，抑或是以其獨特的陰柔氣質，在書寫中呈現迥異於男性旅者的風格？另外，這些英國女性旅者到達非西方世界，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勢力仍然強盛之際，她們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希望能夠檢視她們如何再現沙漠，她們的自我認同在性別、種族、宗教、階級種種因素糾葛交結之際如何流動、如何建構。</p> <p>講者簡介： 李根芳副教授，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研究興趣為文化翻譯，批判理論，性別議題與旅行文學等。發表論文散見於中外學術期刊，如 MELU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中外文學》等，譯著包括《勘誤表》(Georger Steiner's Errata)、《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John Storey's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等。</p>
--	--

演講者	清大通識中心劉瑞琪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4-08
講題	Helen Levitt 的女性漫遊攝影
演講摘要	<p>演講內容為首度從女性漫遊者 (flâneuse) 的角度，探索現代街頭攝影與地鐵攝影。從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以來，漫遊者一直被視為現代藝術家的典型，在藝術史與文學史的相關研究汗牛充棟，從 1980 年代下半開始，女性主義學者才開始爭辯在現代時期是否有女性漫遊者？伍爾芙 (Janet Wolff) 與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以降的學者，一再地論辯出悲觀的結論。當講者開始以海倫·勒薇 (Helen Levitt, 1913- ) 的具體個案，探尋女性漫遊者的活動蹤跡，豁然發現女性漫遊者與公共空間的邂逅，確實激盪出與男性漫遊攝影家殊異的關係、視象、與歷史。勒薇從 1930 年代晚期迄今，一直是深受喜愛的美國街頭攝影家之一，她從 1930 年代下半開始，經常獨自在紐約貧窮區域的街頭閒逛，觀察並拍攝周遭的人物與事件，她的街頭攝影展現女性在城市公共空間的現代性經驗，以及女性漫遊者的特殊觀看方式，她在 1960 年代末期拍攝的紐約地鐵眾生相，也表達了與她的街頭攝影類似的女性觀點。演講將藉由比較勒薇的街頭攝影與地鐵攝影，與影響她的漫遊者攝影家布烈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 與艾文斯 (Walker Evans, 1903-75) 的作品差異，深入分析勒薇如何呈現女性漫遊者對城市現代性的觀點？</p>

	<p>講者簡介：  劉瑞琪，美國 Bryn Mawr College 藝術史系博士，曾於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任教，現為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專長為西洋近代視覺文化的性別與認同議題，近年來致力於女性攝影家研究。</p>
--	---

演講者	台大外文系黃宗慧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4-15
講題	公領域的時尚女性與／或私領域的歇斯底里者 —從十九世紀末的巴黎女人談起
演講摘要	<p>談城市現代性，自然要談十九世紀末的巴黎。隨著當時交通的便利化，大量的人口可以迅速由鄉村移往城市，而硬體建築的革新則帶來空間上的變化；除了時間與空間呈顯了快速變異的可能性之外，在這個百貨公司快速興起、奢侈品開始普及化的年代，巴黎女人以各種新興的服飾與化妝技巧美化自己的行為，也成為劃時代、現代性的一個面向，更成為當時繪畫的主題；James Tissot 即是一例，他畫中光鮮的巴黎女人儼然驗證了該時代” Parisienne = modern femininity” 的普遍看法。然而同一時期的廣告雜誌中，也不乏對時尚女性「真面目」的嘲弄，甚至如秀拉或馬內的畫作，亦被認為有將女性肉慾化與商品化的傾向。時尚女性是否為自己開闢了更廣大的空間，成為萬眾矚目與歌頌的焦點？又或者其形象仍難逃被男性類型化後加以嘲諷的命運，是男性用以投射內在恐懼的對象？都一直是女性主義爭論不休的問題。而同樣值得關心的問題是：城市現代性到底為女性本身帶來了什麼樣心理上的影響？若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時髦光鮮的巴黎女人？她們是快樂自得的戀衣癖？還是為強迫性購買行為所苦的歇斯底里者？而對照二十一世紀的時尚女性，情況又是如何？都是本次主題欲涵蓋的重點。</p> <p>講者簡介：  黃宗慧，台大外文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性別研究、動物研究等。</p>

演講者	台師大英語系吳佳琪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4-22
講題	台北與酷兒影像：電影方法與文化理論的辯證

<p>演講摘要</p>	<p>自 2002 年《藍色大門》以來，台灣酷兒電影蔚為風潮，成為被好萊塢邊緣化的台灣/本土電影主流，在市場及評論界皆受注目的作品有《十七歲的天空》、《盛夏光年》、《刺青》等。此次演講將藉《藍色大門》及《十七歲的天空》，初探電影方法與文化理論間的合軌及分歧。演講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就台北在兩部片中的呈現，將其視為台北空間的「酷兒化」，分析台北在影片中的再現或視/聽覺的層次上，承載或建構何種酷兒影像或性別政治，但同時探討此種電影閱讀方式產生的理論性問題與矛盾。第二部分則進而尋求「酷兒化」/「模糊化」既定電影或文化理論（queering a movie method or a cultural theory），以及開發新電影理論方向或新概念架構的可能性，試圖挑戰某些電影閱讀方式。然後在理論與方法的思索與辯證中勾勒出台灣電影獨一無二的「酷兒性」（queerness），以及這些作品同時在台灣電影發展史以及世界酷兒電影版圖中的位置與意義。</p> <p>講者簡介：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理論評論系博士。師大英語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電影與文化理論、華語電影及影展論述、1945 年全球電影史、酷兒影像等。</p>
-------------	---

<p>演講者</p>	<p>交大外文系馮品佳教授</p>
<p>演講日期</p>	<p>2009-04-29</p>
<p>講題</p>	<p>再現華埠：華裔美國文學與電影中的唐人街</p>
<p>演講摘要</p>	<p>以少數族裔文學的傳統而言，族裔主體性的發展經常植基於與族裔空間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之上，族裔空間既是其記憶滋生依附之所，也往往是蒙受種族歧視、陋巷區隔之辱的地方，因此有人選擇出走、有人選擇固守，而對於族裔空間之再現也因此殊異。華美文學與文化傳統中華埠的空間再現一向為重要的主題之一，此次演講將就王穎(Wayne Wang)的《喫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尋人》Chan Is Missing、《點心》Dim Sum 三部以描寫華埠為主的影片，黃玉雪（Jade Snow Wong）的《五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趙健秀（Frank Chin）的《杜老亞》(Donald Duk, 1991)，以及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骨》(Bone, 1993)討論華裔美國導演與作家再現華埠空間的不同方式。</p> <p>講者簡介： 馮品佳，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外文</p>

	<p>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教授、中華大學兼任講座教授、交大電影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理事以及比較文學學會監事。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交通大學副教務長、外文系系主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曾獲得 2007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主要研究興趣在於英美小說、女性書寫、離散文學、少數族裔論述以及電影研究。著有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1998), En-Gendering Chinese Americas: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ers (2001)；編有《重劃疆界：外國文學研究在台灣》(1999, 2002)、《通識人文十一講》(2004)；《影像下的現代性：影像與視覺文化》(2007；與周英雄教授合編)；譯有 Love(2005；金鼎獎入圍)。</p>
--	---

演講者	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楊祖珺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5-06
講題	女性參與聲援台灣三農的社運經驗談(2004.12~2007.06)
演講摘要	<p>1.女性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優勢與劣勢 2.聲援台灣三農運動過程中的姊妹情誼 3.農家樂嗎？</p> <p>講者簡介： 楊祖珺，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專任副教授，美國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傳播研究所 Ph.D.。1977 年以後曾擔任電視、廣播、報章、雜誌等媒體的創辦人、製作人、主持人、編輯、記者等職務，參與台灣社會運動多年至今。</p>

演講者	華梵大學外文系黃燕祺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5-06
講題	屏東魯凱族好茶部落的影像故事
演講摘要	<p>本次演講以紀實攝影與紀錄片為出發點，探討魯凱族好茶部落遷徙安置的議題 好茶部落(Kochapongane)位於屏東縣霧台鄉隘寮南溪下游, 因為天然地理環境使然, 1996 年賀伯颱風時, 大量土石流來襲沖垮房屋活埋村民。2007 年八月, 好茶村在梧提颱風巨雨中重創: 暴漲溪水沖垮全村對外唯一的交通便橋, 三十多戶房屋被土石流淹沒, 村民搭乘救難直升機逃離家園, 最後被安頓在屏東洛麟鄉隘寮營區暫居。兩年過去了, 土石洪流淹沒村莊房</p>



	<p>的恐怖景象猶在眼前，但現實的遷村議題再度浮上檯面，歷年來好茶部落從祖靈地舊好茶村遷到新好茶村，再度的遷徙將讓他們離故鄉根源越來越遠，面對現實環境，好茶部落的族人要如何走過這段由毀壞到重整與保持文化尊嚴的歷程？</p> <p>講者簡介： 黃燕祺，清華大學外文所碩士，現為華梵大學外文系講師，研究興趣為後殖民文學與影像文化。</p>
--	---

演講者	世新大學社發所夏曉鶻教授
演講日期	2009-05-20
講題	騷動流移—資本主義再生產危機與草根的抵抗
演講摘要	<p>從全球化的視角解析婚姻移民在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現象，並以歷時近十五年的實踐研究基礎，分享新移民女性的「主體化」過程：如何從被噤聲的弱勢者，成為台灣以及國際婚姻移民女性運動的推動者。</p> <p>講者簡介： 夏曉鶻，自 1994 年開始研究「外籍新娘」議題，本著研究與實踐不可分之原則，1995 年於美濃創立「外籍新娘識字班」，經八年的培力工作，終於 2003 年在新移民女性的積極參與下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同年，串連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民間團體與學者專家共組「移民／住人權修法聯盟」，致力於台灣移民／工運動的推動，並積極與國外移民／工運動團體結盟。著作包括《流離尋岸》(台社，2002)、《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左岸，2005)、《跨界流離》(台社，2009)《騷動流移》(台社，2009)</p>

### 三、議題探討結論

以下這部分是每週上課的討論議題，內容節錄自同學的心得報告：

#### ※(2/25) Topic 1 : Geographies of Gender

本週選讀 Don Mitchell 的“Feminism and Cultural Change : Geographies of Gender”，強調性別概念被建構的動態過程。從地理學的角度，我們可以看見性別概念透過特殊空間結構被生產，同時性別概念本身也直接影響了空間的生產。換言之，性別與空間之間是相互建構的，並且同時影響了其文化的內涵。公/私領域的空間分化是一個例子；「男主外女主內」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角色的觀念，強化了公/私領域的分野，而公領域中許多對女性不友善的空間更進一步的將女性排除在公領域之外。然而，Mitchell 引用 Domosh 的論點，指出女性並非被動的全盤接受這些價值規範，反之，她們在公共空間中一些(Domosh 稱之為 *polite politics*)反制策略，挑戰了原有的公/私領域之間的分野。Domosh 的論述更進一步展現了性別與空間在建構過程中的複雜性—女性在公共空間的策略，其實都可視為一種潛在的顛覆，重新挑戰既存的性別價值與空間界線，形成另一個動態的建構過程。另一篇 Linda McDowell 在“Gender, Identity, and Place : Understanding Feminist Geographies.”一書中的導論章節，則是針對女性主義地理學作概略性的介紹。傳統強調性別的差異，不論是象徵意義的建構，或是在物質的權力關係，均構成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結構。而 McDowell 引用 Pollock 的定義，認為女性主義不僅是一理論性的分析觀點，同時是也是政治行動，用以批判並顛覆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女性主義地理學近年來的研究亦立基於此，將地方、流動、全球化等概念納入，探討全球化是如何改變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經驗以及性別權力關係；同時將論述分析視為社會運動重要的一環(陳德容)。

讓我們想想學校裡的「愛心媽媽」。當我們有愛心媽媽，我們有沒有愛心爸爸？假如我們都認可「愛心」這個語彙並不中性，那麼愛心媽媽這個詞是不是也加強了女性與陰柔特質的連結？再者，愛心媽媽是不是反應了女人的社交活動受到限制？然而，當我們說女人在空間上受到限制，被困住了，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還是空間設計的問題呢？如果有女人意識到自己受困了，會不會曾經想過逃出這些限制？空間的規劃設計者又在哪些程度上可以改善這樣的情形呢？(依陵)

#### ※(3/4) Topic 2 : Modernity, *Flâneur*, and the City I

在〈現代生活的畫家〉中，波特萊爾將美的組成元素一分為二。其一為存在於經典藝術與文學作品中，一種永恆不變的普世之美 (*general beauty*)，其本質難以言喻；其二為展現於當代時尚、風俗、道德等中，一種相對的、隨境而轉的特殊之美 (*particular beauty*)。若說「朝生暮死 (*ephemeral*)、稍縱即逝 (*fugitive*)、以及純屬偶然 (*contingent*)」乃是現代性的本質，藝術家的首要之務，便是自瞬息萬變的時尚風潮中萃取出普世之美感，化無常為永恆，化短暫為不朽。而波特

萊爾認為，藝術家要在快速流動的現代生活中，精準地捕捉當代的風俗 (manners)，他必須同時具備成人的敏銳觀察與分析能力、熟稔的表現技巧以及孩童的無窮好奇心。而且，他必須是個走入人群的城市漫遊者 (flâneur)，是個如同魚兒依水而居般依附群眾而活的「群眾之人」(the man of the crowd)(嘉瑩)。

愛·倫波的〈人群中的人〉內容描寫一個觀察人群的人，接著他跟著其中一個狀似可以疑的老人進行了夜晚的城市之遊，其中經歷城市的街道、公園、廣場、商店，最後又回到原來的大街上。老人又引他到城市邊緣的廉價酒館，看到城市的另一面，悲慘、貧困、絕望與犯罪的角落，在這裡可以看到城市空間的區隔。最後，發覺老人只是漫無目的走來走去。在城市中人群是最不能夠掌控，不斷地流動。故事中雖然沒有任何高潮的情節發展，所描繪的是城市中的生活。老人與跟隨老人的人，都是人群中的一員，唯一不同是跟隨老人的人採用觀察者的角色，這是漫遊者的特質。班雅明引領我們看到在這個故事中的物質層面，煤氣燈、櫥窗將街道變成商品人的世界，對於漫遊者而言就像是一場夢境一般，但是人與人在這個世界是相當疏離與孤寂的。從波特萊爾、愛·倫波到班雅明中，從藝術評論、文學作品到文學評論當中，呈現出城市文明在現代化社會所面臨的價值觀點的轉變。漫遊者是城市文化的具體表現(姿瑾)。

### ※(3/11) Topic 3 : Modernity, *Flâneur*, and the City II

看完 Berman 對於現代性及波特萊爾思想的反芻後，我印象最深的是裡面的一個警告：絕不可忽視現代性物質層次上的進步與其帶來的貧瘠、空泛與醜惡。更要特別注意的是，現代性的堂皇之美與它裡面的醜敗是一體兩面的交纏共生的。現代性的恐怖與誘惑都在於其展現的市景上，「即使是最能洞悉一切的腦袋，也不由得為所見的精巧設計及魅惑奇觀發出的耀眼光芒所懾，因而對於其中附生的黑暗視而不見」——就是現代性的這種力量，使得波特萊爾在見到殺害了兩萬五千名巴黎市民的軍隊後竟不由得對於壯盛的軍容——或許他們的軍靴還印著市民的血——發出讚嘆；或許也是這種力量，使他稱頌中產階級汲汲營營永無止境追求的人類進步(human progress)，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成果。這的確是現代性似乎無所不能的神奇力量所展露的一小角恐怖，其力量甚至可以攫獲最自由的心靈(可霓)。

在 Harvey 的文章末提到巴黎的意象常常和女性形象作連結，例如巴爾扎克認為巴黎是神秘的、善變的、不可預測的；左拉認為巴黎是個墮落而受到殘忍對待的女性；甚至 Harvey 提到，大改造後的巴黎淪為「賣淫的狂歡場」，這種都市象徵和性別之間的連結是怎麼產生的呢？是因為現代都市具有矛盾和神秘的面向，而剛好女性也被視為矛盾神秘和難以預測的，所以會有這樣的連結？但現代性的特質也有講究精確的、可計算的、講究理性的面向，而都市正好體現出這種特質，那不是和女性的意象相反嗎(如珺)？

#### ※ (3/18) Topic 4 : Modernity and the Feminine Space I

本週討論的範圍則亦相當有趣，加入女性主義的視角之後，使一切看來完好且定論了的又再次鬆動起來。Elizabeth Wilson 在〈隱形的都市漫遊者〉中認為，在後現代的女性主義論述看來，都市漫遊者其實被限定為愉悅的男人、以視覺佔據城市空間的男人，體現了男性凝視，而其之所以能自由漫遊於城市之中，主要亦來自於性別上的自由，即因身為男性而擁有的自由。Janet Wolff 在討論波特萊爾、班雅明的漫遊者時，也針對他們對女性的視而不見進行論述，並採取「flaneuse」來專指那些女性漫遊者，她認為在以往的論述中缺乏公共領域(主要是男性的)之外的、邊緣的(主要是女性的)生活記錄。通過公私領域的性別劃分，男性屬於公共領域，女性屬於私領域(家庭)，然而，無論是被迫閉守於家庭私領域中的女人(即使她可能隸屬於中產階級以上)，亦或是屬於下層階級而外出勞動於公共領域的女人，皆不被看見，因而，性別其實是階級考量之外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切入點。(佩苓)

Buck-Morss's analysis covers a wider range than the other two. Yet, in the vein of this week's reading, we may focus on male impotence and the decline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In the extremely commoditized world, Benjamin claims that the sandwichman is the last incarnation of the flaneur. However, Buck-Morss points out that Benjamin ignores the class distinction. Though conceptually these two may converge in the sense that they bear something to sell on themselves, their economical difference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be truly identical. However, in such comparison, the figure of the flaneur has turned from the archetypal modern subject who flaunts i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 to another modern object penetrated by the power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thus, is deprived of true agency (or revolution potential). Prostitute, or rather prostitution, is discussed here as a female version of flaner. It is in prostitution that the human-commodity convergence best manifests itself. The urban environment seizes to be the homeland for the flaneur. What the flaneur-sandwichman-whore trinity exhibits is the impotence the male bourgeoisie feels in modern context. Like their inferiors, they are also turned into commodities by the commoditized world they helped to create. Their dream of material welfare in urban life has turned into hollow phantasmagoria. To be out of the money economy and all reifying forces it brings, Benjamin suggests that we reverse the images and "recover the child's dream of utopia, where things are humanized rather than humans reified" (qtd. In Buck-Morss, 143). However, the solution appears to be somewhat naïve. Children may have a greater distance to the commoditized world than the adults do, but are they out of the cycle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璐綺)?

#### ※(4/8) Topic 5 : Modernity and the Feminine Space II

Griselda Pollock's and Liu Jui-Chi's articles both analyze "the space of feminin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or space represented, while the former author focuses on female artists' impressionism painting and the latter on Francesca Woodman's photography of self-representations. They have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cerns: Pollock's article examines from socio-historical, economical and gendered concerns, while Liu's from psychoanalytical ones(幸怡).

As Pollock implicates that "female sexuality could not be directly registered", female sexuality seems can only be legitimately represented by male artists but not articulated by women on their own. The invisible boundary between artists of different sexes at that time is "body": whether they have the legitimacy or "right cause" to have direct encounter and process of body, of nudes. The represented spaces of body thus become a manifested arena where male and female artists are separated, and this efficiently responds to the dividing sphere that Wolff proposes on the female experience in modern cities(可霓).

#### ※(4/15) Topic 6 : Modernity and the Feminine Space III

本週延續女性空間與現代性的討論，將空間鎖定在城市的公/私空間及百貨公司。Nancy Duncan 將討論焦點鎖定於北美與英國的性少數族群（如同性戀者與性工作者），指出他們將長期被視為「私」領域的議題搬到檯面上（公領域）有助於逾越二元的領域劃分與疆界。首先她介紹傳統上將公領域與私領域管轄與治理上的不同，前者是一個可供民眾辯論、質疑與監視的空間，也因此主流行為才被允許發生，後者則擁有相對性的自主權，也因此容易在這個空間內重複上演固定的性別製碼，或者暴力。Mica Nava 開宗明義的說，她要質疑的是「缺席」，質疑的不是女性是否真正缺席，而是歷往的文獻背後隱藏的男權架構讓「真實」缺席。作者介紹女人在百貨公司的消費領域中逐漸躍升為要角，這種真實的狀況因著男性被排除在外的恐懼，只好使其消音，或將這種性別限定的活動醜化，甚至將其擴大至女性本質論的問題。張小虹的文章指出百貨公司具有建構主體的意義：階級上，以前只能透過視覺觀看的物件，透過金錢交易，可以轉變成擁有物，灰姑娘也可以是公主；性別上，展示窗如同拉岡的鏡子，讓女性消費者看見自己渴求的理想形象。只要有錢可以消費，進入百貨公司等於投胎換骨，無論是外觀還是內在(依陵)。

而 Nava 一開始先指出在討論女性與現代化經驗時，缺乏相關的文獻可對話，並以 Wolff, Vickery 與 Wilson 過去的研究指出女性並沒有在現代化城市中缺席，在現代化都市中因為人群的聚集，許多地方是已經打破階級與性別區分的公共空間，女性的公共空間的現代性體驗存在，只是不被作家所記載。此外，Nava 與張小虹的文章中都認為在傳統的都市景觀描述中「公共女人」被視為是墮落

的，而家中的女人是較為貞潔的，但是在百貨公司出現之後，女人可以在同為公共空間的百貨公司中聚會與購物，因此這樣的區分即被打破。當時的百貨公司提供的是多功能的娛樂，除了是商品交易的地方之外，因為也舉辦國際展覽、陳列美術品，有些更附設博物館，因此百貨公司對於中產階級而言也是一種文化資本。但也因為百貨公司是開放性的，因此也聚集了不同的階級與陌生的人，而商品與服飾便成為了社會地位的標示。百貨公司除了是提供女性購物的地方之外，因為需要大量的服務人員，因此也提供了很多工作階級女性就業機會(盈君)。

張小虹以郎/狼作為欲望的譬喻談百貨公司、從「郎是商品」單純談男女關係到「商品是狼」指涉商品感應力，將性別情欲轉換成商品本身角色，中產階級婦女-消費者，貨物-商品的「變成」過程的辯證。以中產婦女與商品的鏡像誤識討論性別與階級的建構。作者指出空間因消費者而發生，且消費者在空間裡建構主體。而商品的抽象價值與視覺的交互感應力產生超現實的詭異情境，在精神幻視中有戀物與懼物兩面。作者最後將百貨公司作為所有中產階級女性難以抗拒的場所。作者樂觀的中產階級場域，以消費為上作原則，強調商品吸引力的論述使得女性的主體性反而變成在商品魅惑之下的客體。過度頌揚中產階級的消費層面，不只忽略商品生產過程中其他階級面向、商品製作上游的男性預設產出，也忽略櫥窗外觀看商品無力購買的他者。如今，百貨公司與女性能直接地聯結想像，女性成為當代消費場所主體，漫遊者何以不在現代街頭閒晃了，男人不再逛街，百貨公司變成女人的地方了？男性在當代都市經驗又轉變成什麼呢(敏真)？

#### ※(4/22) Topic 7 : Myth, Sexuality, and the City

「首先是有了城市...」在閱讀 Jonathan Roban 的 soft city 的時候，想起了 Soja 在《後大都會》的開頭用戲劇化的寫法，將「城市」的建立與聖經中的「首先是有了光」做對照，城市是一切的起源，是社會生活得以發展的物質基礎。從考古學的資料來看，過往線性的從狩獵、採集、農業、村莊，再發展到高度分工的城市文明其實可能是刻板印象的預設。城市表示著穩定的空間集結，一開始就是革新的中心，反而是文明得以進展的重要因素。Roban 和 Soja 都抱持著「擁抱城市」的立場，然而城市的複雜萬狀、夢想與幻滅層層疊疊，總是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得以上演的最佳場景。而 Roban 將這種對城市的複雜情緒用詩意的方式定調為--軟城市。對於鄉村生活的鄉愁，這是一個歷史的不斷循環，城市作為萬惡的淵藪而被厭棄，然而不管是太陽城市或是光輝城市，都是凌駕於活生生的人的空洞場景，隨著科技更加進步，Mumford 與科比意期待新科技是城市的救贖，但純粹理性解決不了不純粹理性的人生難題(若瑩)。

Parsons 的 < Mythologist of Modernity > 重新檢視波特萊爾以降對 flâneur 的論述，算是復習總結前面所一連串對 flâneur 的討論。Parsons 認為 flâneur 定義中具有曖昧性、矛盾性與辯證性，從波特萊爾的城市觀察者、齊美爾連結都會心靈、班雅明的歷史觀察，到 20 世紀末期女性主義者對公私領域的辯論，將 flâneur 概

念化成一種都市現代性的人物原型。Parsons 比較不贊成 Wolff 和 Pollock 將漫遊者視為一種特定社會歷史的人物，他認為在兩個方面有問題，第一為雖然女人被限制在城市分為公／私結構中，但是仍有跨越的可能（如扮裝者及妓女）。第二是他認為她們過度解讀班雅明式 flâneur，而忽略了在班雅明之後是一種城市觀察與行走的概念隱喻。Parsons 認為 flâneur 是高度複雜意義的概念，他所採用是一種雌雄同體的方式去理解 flâneur 的凝視。Parsons 的討論讓我們回顧了 flâneur 的發展，在這辯論當中 flâneur 因為其意義的曖昧性，以及與現代性之間的學生關係而形成論述上豐富的層次，Parsons 的 androgyny 的批評也試圖開啓另一種對於 flâneur 視野(姿瑾)。

#### ※(4/29) Topic 8 : The Body and the City

Sennett 選定了法國大革命剛暴發的第一共和國民公會時期，作為論述巴黎的時代背景；此時的巴黎出現城市史中首次出現的自由身體意象，但這樣的身體意象其實也是在統治者的權力規訓、身體控制的統治中的；所以 Marianne、Boullée 的空間規劃、刻意營造的斷頭台群眾圍觀、二大節慶 Chateaufort 和 Simonneau、David 描繪 Marat 和 Bara 的二大殉難者名畫等，其實都是當權者為遂行統治便利所操控的權力規訓和身體控制技術；只是說這樣的操作方式，就讓城市空間性充滿令人無法想像的無情、恐怖、冷漠；但城市居民也因為流血暴力的場面看多了，而感覺麻痺，所以革命空間也無法再引起城市居民的興趣(世政)。

Stallybrass & White 以下水道的凝視與碰觸感染為題，推演城市象徵與身體的關係，採用文本分析與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最後指出在 19 世紀，那些門檻具體貫穿城市，清楚地說出貧民窟、下水道、遊民、野蠻者與老鼠被隔離，依次再變換為身體的推演，作者提出這不是次要的編碼或主觀的心理內容，而是涵蓋人類心理分析的社會結構譯碼。Pike 延續 Stallybrass & White 文章，也以下水道為題，擴大僅垂直的城市精神分析觀點，以倫敦與巴黎兩個城市做為論述的建立的場域，研究方法採文本分析，發現下水道象徵的更具脈絡化的意義，性別上 Pike 指出 19 世紀的娼妓被與城市裡的下水道聯結，使得賣淫被當作硬體設施，是對抽象空間的組織管理，而不是社會議題(惠君)。

#### ※(5/6) Topic 9 :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城市與鄉村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借用 Raymond Williams《城市與鄉村》一文，可以更深刻的來討論《戀戀風塵》和《無米樂》兩部影片。Williams 是馬克思式的觀點，他以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感覺結構，來理解並批判城市與鄉村對立的問題。他認為城市和鄉村不是二元對立的圖像，他們本身和彼此間的關係，隨著歷史與社會變遷的過程不停的改變。城鄉的意象一方面沿襲中世紀以來對城市和田園的想像，一方面又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科技演進等影響。這種集體「共享的感覺結構」，來自於現代單向、受限制的溝通形式，以及私人轎車

的交通方式所導致的結果。他指出我們二分城市與鄉村的想像，讓城市屬於進步的、未來的那端，而鄉村成爲了過去，這將使現在的我們變得無法定義而漂浮在外。然而因爲在發展的進程中，人們處於追求進步與緬懷過去的拉扯中，所以將鄉村、老街視爲一個還可以返回的過去，雖然是一種時空的錯覺，卻可以讓都市人不再孤旋在外，而是有一個歷史的脈絡、一個自我的定位。《戀戀風塵》片頭裡穿越山洞的火車，不僅通往鄉村和故鄉，也通往青澀的初戀。故事場景區分在十分和台北。台北是按照資本主義生產和利益運作的城市，印刷和縫紉都是最典型、機械化的工作。影片中再現的台北是個危險的地方：阿雲的蕃薯被搶、阿遠的摩托車被偷，燙傷、割傷、老闆毒打、、、都市工作受到的各種傷害沒有賠償，還要負擔昂貴的醫藥費。然而十分卻是個安全又快樂的故鄉，它是阿遠北上工作、遭逢兵變打擊後，還能夠回去的過去。片尾阿公重複說著：「照顧蕃薯比照顧巴參、高麗參還累」，蕃薯明明就是隨丟隨長的植物，怎麼需要細心照顧呢？這暗喻著鄉土遭受外來發展的壓迫，已經愈來愈難以生存。有趣的是，侯孝賢的兩部有名作品《戀戀風塵》和《悲情城市》裡動人的鄉愁，讓十分和九份變成台北人共同的故鄉，意外的爲都市人創造一處懷舊空間，如今這裡充斥著與當地幾乎沒有關聯的懷舊商品，讓都市造成的遺憾和茫然感，透過旅遊和消費得到補償(正嘉)。

不同於「戀戀風塵」，「無米樂」裡的角色皆以年華老去。他們都是一生守護土地的人，同輩與子女或許離鄉，但他們終其一生都是認份耕作的農人，維持活絡的社群情感聯繫。主要角色昆濱伯夫婦也是由傳統的媒妁之言撮合成婚。似乎一切都是最保守、最傳統。然而，這部影片對我而言有趣的地方來自於畫面之外。持攝影機的影像工作者(莊益增、顏蘭權)自身也如同阿遠和阿雲，是離鄉入城學習工作的游離人口。透過他們的回眸，菁寮的意義不再僅是一個即將沒落的農村。昆濱伯焚香祝禱的儀式構成影片的框架，既是他個人心願的傳達，也是對目標觀眾——都會中產階級——的召喚。影片以節氣爲章節推衍，隱含農村是有機循環體的預設，然而節氣順暢與否卻不是片中最主要的問題點。影片前半雖呼應了傳統的農業敘事——農人是靠天吃飯的，影片後半卻指出位於都會的行政中心所制定出的農業政策才是真正掌控農人收入的黑手。四五十年代的抑農政策和近幾年來的 WTO 條款都以整體國家發展爲由犧牲了農民的權益。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全球化浪潮無所不在，襲捲了僻處台南鄉間，幾乎都要被島內遺忘的小小農村和末代農民。影像工作者帶著身上的鄉村進入都市、再由都市的視角來回視與重新建構鄉村，城鄉的議題因而有了交錯的層次，涵納了官方大歷史與個人小歷史的盤根錯節。笑看人生無米樂的昆濱伯也憤恨的高喊滅農，城市/資本主義並不在他方，而在他所身處的土地裡。老農們切身的城鄉遭遇經驗單純但深刻，透過莊益增與顏蘭權的取鏡和剪接成爲一個具抵抗意義的小敘事，讓多數已經現代化、都會化的中產階級回眸凝視這個他們所離去的原鄉——原本以爲是停滯的其實仍具生命力，無米樂的開朗背後是對壓迫的無奈(璐綺)。



### ※(5/13) Topic 10 : Gender, Class and Global Cities I

Saskia Sassen 在“Introduction: Whose City Is It?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laims”中探討這是誰的城市?城市與全球經濟的關係是什麼?藉由探討主要城市的經濟分析,可以讓我們看見全球化下的經濟多元性與勞工文化,且發現具體在全球化下尋找在地化的過程,也可以辯證大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主義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聚焦在城市,可以讓我們具體的說明,透過經濟全球化,全球的尺度內的地方策略,地方與地方間會互相接軌,這是新的地理上的集中性,是地理學新的認識論,跨國節點。此篇導論說明此本書主要處理四個主題,第一為移居,第二是受壓迫的弱勢者變成重要的全球經濟一部分,第三,探討新的雇用關係以及因為新的雇用關係而產生的不平等,最後為數位化與電子空間的影響,使得政治重新定位、公私變模糊等現象,並提及全球城市與高科技產業地區,將轉變成國際的舞台,使全球主導權遠離國家政府(惠君)。

四月時院線上映一部李奇導演拍攝的移工電影《岐路天堂》中除了描述外勞在台的不利勞動環境,另一方面也呈現印尼籍女主角和泰國籍男主角以中文溝通的異地戀情故事,我或許可以感動在他們不友善大環境求生存的夾縫間,仍能想辦法在旅館約會,然後用不流暢的中文說:「真不想回去工作」,只想感受彼此體熱溫存久一些也好,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污名或偏差再現外勞族群形像,導演告訴我們: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渴望情感慰藉。但這樣的愉悅當劇中男女主角面對苛刻勞動結構與法治時卻沒有太大效用,並非要指責導演必須拍攝一種外勞抗爭獲得成功的愛情故事,而是個人認為女性移工在異地若要成為「贏家」除了特殊極少案例,否則可能藏有更多不為人知的辛酸史(琪君)。

### ※(5/20) Topic 11 : Gender, Class and Global Cities II

藍佩嘉的文中則討論文化他者被種族化、層級化的過程。國際情勢、經濟狀況與仲介公司的操作無不影響了台灣人對於印菲越南等外籍傭人的刻板印象。如此印象,像是對深色膚色的低賤聯想、對於低等的先天層級,就如同印度的種姓制度一樣,影響了雇主對於僱傭的要求與待遇。不同桌而食或僅提供剩菜飯、衣服要手洗不能共用洗衣機、穿著要體面打扮要乾淨、除了打掃外不能踏入家裡的某些區域等等不合理的待遇,實則是透過乾淨/汙穢,高貴/低賤的二分標準來確立自己身為工作提供者(或經濟救援者)的身分。這讓我想到 Arundhati Roy 的《微物之神》中提到,賤民(又名為「不可碰觸者」, the Untouchable)在幫高貴的人家中打掃時,絕不能留下任何自己碰觸過的痕跡:擦拭地板得由內而外擦拭,如此便不會讓人誤踏到他汙穢的腳印。Roy 說,殖民地的歷史就像是一連串不存在的腳印。雖然外籍勞工的處境沒有像是為宗教歷史所深化的種姓制度一樣誇張,如此刻意建立起的區別與優劣地位,象徵資本主義霸權如何重蹈了帝國主義的宰制(可寬)。

Nicole Constable 以香港菲籍「移工女傭人」讓我們細緻地看見公、私領域模糊帶來的矛盾與衝突。當家等於工作場所時,移工的身份就是「工」與「傭」,

消除了身為「人」應該享有的基本選擇與需求：隱私、情慾、對自我內在與外表的選擇權。文章中呈現了身為移工女傭的弱勢地位、限制與各種來自雇主的剝削，但作者認為透過小事的累積反抗，也讓他們產生主體性與談判空間。我對這點感到懷疑，就如同我無法贊同 Sassen 認為至少這些移工拿到進入生存迴路門票，而原母國甚至有些人無法籌錢進入全球化的階梯。這種說法，於我，總仍含有位於高階享受地位的姿態意涵，忽視了真正解決「無法移動」的這群人的處境及辦法，以及陷入將性工作者的現況歸於「主體選擇」的泥沼(依陵)。

## 四、研讀成果

### (一) 慾望或恐懼？論德萊塞之《嘉莉妹妹》中的女人與城市

蔡念穎

完成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在當時可以說是一部驚世駭俗之作，也正因為如此，此作被出版商塵封了七年之久才得以正式問世。就當時社會風俗看來，儘管已進入工業化資本主義，人們對女性的維多利亞式價值觀感仍使得這部作品被標上墮落、敗壞的道德標籤。身為報社記者的作者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也因其內容大膽且用字多俗語，風格大大迥異於過去古典文本，而挑戰了當時代的讀者目光。以今日之標準看來，《嘉莉妹妹》的劇情或許和現代司空見慣的辛辣灑狗血肥皂劇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但是放在美國逐步進入現代化的二十世紀初期，卻仍展現著某種普世價值觀的轉變過程，也刻畫著人心中深層的信念正受到外在世俗波動牽引著。放諸不同角度而觀之，看似冷靜但充滿衝突掙扎的《嘉莉妹妹》仍具其深刻的時代意義。

嘉莉的故事開始於一典型鄉下女孩搭火車進城到芝加哥謀生。在火車上嘉莉邂逅了旅行推銷員杜奧特(Drouet)，而後成為她進入芝加哥中產階層生活的伏筆。原本打算依附姊姊和姊夫的她，在嘗到工廠勞力剝削及寄人籬下人情冷暖之後，接受了杜奧特的恩惠成為他的姘婦。之後她又跟著杜奧特的好友，沙龍經理郝斯華(Hurstwood)私奔到紐約展開另一段生活。幾年之後郝斯華的失業使得嘉莉被迫出門找事，也重燃了她對舞台的熱愛並開啓了事業成功的大門。儘管在城市的大染缸裡波動沉浮，嘉莉時常是以新女性之姿出現在各式批判文獻中。嘉莉由勞動階級一躍成為劇場名伶，相較於中產階級郝斯華最後的落魄殞落，自然是強烈挑戰著過去男性典範為主的思維；而書中主要的場景：二十世紀初期的芝加哥和紐約，也成為批評切入的重要角度。其餘仍有許多評論家著重於嘉莉的物質生活和商業層面做分析。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腳步，純樸少女踏入城市追隨幸福但最後墮落的場景並不乏見，女性身影出現在街頭和工廠商店之間，亦是現代城市中不可抹滅的景象。嘉莉駐足在百貨公司中看著琳瑯滿目的商品，或是在大街小巷中穿梭期望能謀得一職的勞工階級形象，都在顛覆著過去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以男性為主的城市漫遊者

(flâneur) 論述。城市和人群提供了文本更多的刺激和想像，城市中的單身女性，或更甚者，受誘惑的女性，在街頭中遊走佇足的身影，更提供了城市經驗文本更多的可能性。

就城市空間與嘉莉的關係而言，巴特爾 (Bulter) 針對嘉莉眺望窗外街景的情節，分析認為城市做為一個邊界 (frontier)，提供了主角本身更多、更往外拓展的可能，無論是物質層面，或是心靈成長的部分。就這點看來，城市對女性的影響是正面的，它如同一個想望的立足點，提供了角色更深入發展和成就自身的動力。除此之外，城市生活經驗的描繪，尤其是嘉莉與劇院的關係，更是書中顛覆舊有秩序的一重點。因此，布瑞吉娜 (Brezina) 的論文表示，在原有的公私二分秩序裡，劇院提供了一力度去模糊原有的疆界畫分。女性登台不只得到了物質資本上的報酬，更能進而對文化和社會產生影響，得到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而變動了公私領域的分界 (226)。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登台的嘉莉和落幕後所扮演的角色，兩者似乎關照著彼此，也同時造就了角色在實質上與心理上的改變。然而，嘉莉與城市的關係，絕非必然的加乘或削減，而就歷史、文化和社會背景等層面看來，《嘉莉妹妹》一書雖潛藏了許多顛覆舊有的力量，但仍然難逃許多男性視角下的產物。嘉莉在收下第一位情人杜奧特的第一份禮物：「兩張柔軟的、綠色、漂亮的十元鈔票」(64) 之時，她就並非原先來自異鄉追求獨立夢想的女孩，而成為交錯在物質、慾望和男人之間的一個體。嘉莉的故事並非展現單純成功或失敗，一位女性的興或衰，而是在男性觀眾和男性社會的框架下，對照著城市中的情慾和物慾流動，刻畫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產階級男性對變動中的女性與都市的想像。

伊莉莎白·威爾森 (Elisabeth Wilson) 把現代化的城市比喻迷宮，而城市中令人恐懼的群眾則如同希臘的人面獅身怪物，司芬克斯 (Sphinx)，她是女性化身，刁難著旅人過客，如回答不出她的問題即會將他們勒斃。城市中的女性如同神話中的司芬克斯難解，尤其是她們的「女性情慾、不受控制的女性特質、失落的本質，和認同的迷失」(7)。城市中的群眾被注入了女性特質，被強調是以理解懂且令人恐慌的，這樣的觀點除了透露出在男性主觀視角中，女性的謎樣和失控，另一方面，這也同樣將城市描繪為一個難以捉摸的混雜空間。城市和城市中的群眾有太多在中產階級男性理性、規律框架之外的因素，包括外來移民和逐漸顯現的汙染 (包含人或環境)。因此，城市和女性的身影似乎疊合了。他們是在男性無法處理和理性之外的歸屬，也一直是男性試圖去理解、使秩序化的對象，然後企圖再度達成平衡。回到《嘉莉妹妹》的文本中，如同白紙的少女進入了芝加哥的嶄新世界，看似可以理解預測的腳本，確實實際上處處挑起觀眾的危機感。勞工階級的出身和對物質金錢的醉心，也許使得嘉莉難以捉摸但又同時深具誘惑力，但在作者的安排下，許許多多的細節仍透露出文化與社會意識對她們的控制和檢視的投射，最後仍使城市中的女性，或是，城市與女性，成為一可收納、可涵蓋的個體。

## (二) 在城市漂移的房間裡：論邱妙津的「拉子」空間書寫

林佩苓

邱妙津於文壇之崛起，與其自身之殞落，大抵發生於同志論述高潮迭起的 1990 年代前後<sup>2</sup>。回顧歷來關涉邱妙津其人、其文的論述，可發現正如朱偉誠、師瓊瑜所言<sup>3</sup>，邱妙津之開始獲得文壇與社會的廣泛注目，於其自死於巴黎的震撼消息擴散之後乃趨明顯<sup>4</sup>，自此之後，無論談及臺灣 1990 年代的同志文學、同志社會運動，甚或死亡話題，邱妙津都是不可忽略的名字。

由於邱妙津作品中的愛情書寫充滿濃厚的自傷氣息，與其同志之身具有連結性，俾使歷來論述者大多將其推為 1990 年代女同志書寫之代表<sup>5</sup>。回顧前人研究文獻，主要針對邱妙津作品中之性別意識與死亡翳影作深刻挖掘。於邱妙津作品的性別意識方面，劉亮雅以 T 的位置解讀邱妙津<sup>6</sup>，丁乃非、劉人鵬也將邱妙津視為臺灣當代女同性戀 T 主體的文化再現<sup>7</sup>；另一方面，由於邱妙津的自裁而死，以死亡為主題之論述於其死後便縈繞不去，如南方朔於邱自殺後一個月即在副刊上發表專文，內容主要為探討邱妙津的早期作品《鬼的狂歡》中的數篇短篇小說，及其與邱妙津自殺的關連性<sup>8</sup>，而後諸多論述亦就邱妙津的死亡書寫加以闡釋<sup>9</sup>，2006 年《印刻文學生活誌》為其同年出版邱妙津舊著計劃<sup>10</sup>而預先推出的「辭世十週年紀念」中，周芬伶總結前述，細讀邱妙津文字中的死亡與性別。

在上述同志文學研究基礎之下，觀察現今同志研究現狀，2000 年前後同志與空間的關係逐漸成為熱門話題<sup>12</sup>，論述普遍集中於男同志的新公園與 gay-bar 空間<sup>13</sup>、女同志的校園與 T 吧(T-bar)<sup>14</sup>空間，新一波臺灣同志論述顯然主要以同志公共空間經驗為論述主體。固然，同志必須群聚於圈內人畫指之「同志的」「公共空間」的區域中方能袒露同志性向，不被容許現身於普遍意義上的「公領域」空間，因此同志於公共空間之經驗，勢必因其無法現身的性向而與異性戀有所差異，觀察臺灣同志小說，《孽子》中的新公園已多有相關論述；然而，同志因其無法於公領域中現身的情慾，轉往圈內畫指之同志公共空間中袒露情慾之餘，在自我性向無以現身的生活日常之中，是否更將自限於個人私密空間？甚且，同志身處於提供相當匿名性的城市中，自原鄉、母國出走之後獲得的異鄉、異國所帶來的情慾自由之際，又將與其同志之身所帶來的私密性疊合產生如何的空間經驗？

如此一來，重讀作為女同志經典的邱妙津，其可堪觀照的面向不僅止於《鱷魚手記》中的性別辯證、同志現身<sup>15</sup>，其中「拉子」式的私密空間書寫與愛情記憶，亦是另一可堪挖掘的同志文學意象。本文將重讀主要涉及情感書寫之《鬼的狂歡》、《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兼及《邱妙津日記》，觀察在 1990 年代的同志社運路線之後，以及現今趨往同志公共空間論述的主題之外，是否有再闢同志文學論述徑的可能？

### (三) 他者的台北圖像：從顧玉玲《我們》談起

黃正嘉

薩森 (Sassen) 在《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中，點出全球化的兩面，在光鮮亮麗的上層專業人士、資本迴路外表下，隱藏這更龐大的底層物質勞動的過程。也就是說全球城市中，跨國公司的運作，和中產精英的生活方式，是由一群低薪、跨國移工在支持著。而對照在上一章文中已經解釋全球化時代，台北正面圖像出現的意義。我藉由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發現八、九〇年代那「改邪歸正」的台北，是新興跨國精英的文化中介者編織出來的美麗幻影；其中紐約全球城市的想像，被挪用為市民「文化重新向上」的具體符號，而都市資源不均、階級不平等問題卻被隱藏。

本章我將揭發全球資本結構中，台北的另一種面目；我將關注九〇年後的台北，在上層階級認同的新興正面圖像之外，底層階級看到的是怎樣的台北？為什麼以及用什麼方式被看見？其中又潛在什麼問題？從這個問題出發，本文我將選取 2006 年獲得第九屆台北文學年金的作品－顧玉玲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為分析材料。

### (四) 台北東區消費文化的形塑與演變

鄭如琄

想討論台北東區這樣一個消費空間，是如何形成和架構了今天的模樣，亦即多元的消費模式如何聚集在同一處，如何共享「時尚」和「高級」等空間意涵。我將採取以生產面、結構面的取徑討論，分析三十多年來東區商圈消費空間與消費文化的「生產」。之前許多討論消費文化的研究，大多將都市消費空間視為「既定」的，沒有去討論其生產面。一個具「高級」、「國際化」等象徵意義的空間文化絕非憑空出現，消費空間也不是消費者本身主動聚集，任何的消費文化都需要物質基礎，而要打造一個高級的消費空間，開發商、建商、店家以及媒體的角色是首要考慮的。為什麼「經濟」的角色這麼重要？因為房地產具有交換價值，房價與店面租金的高低會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且所謂的風格，背後也不可否認地有經濟因素的考量，畢竟不論是百貨公司還是個性小店，還是要考慮獲利與否的問題。

除了形成與演變的過程之外，東區商圈所具備的文化意義，我也想從生產面的角度切入討論。Neil Smith (1996) 認為文化與消費者的偏好改變不足以解釋空間的改變，他認為所謂的文化和品味主要是先被空間生產者「打造」出來的。Zukin (1995) 也認為，當代城市的文化可以作為資本的一部份，成為都市的「企業」；當代城市文化可作為一種控制，框架都市視覺、形塑都市集體印象，甚至讓公共空間變的「不公共」。美化的、視覺化的都市文化也掩蓋了其中納入與排除的權力運作過程。她認為建造一個城市，除了結合土地、勞工、資本等經濟因素，也有操弄符號、語言來進行授權與排除的過程；一個城市看起來怎麼樣和感

覺起來怎麼樣，反映出什麼可以被看見而什麼不可以。東區作為一個中產階級的消費空間，如何塑造出一種中產階級的、光鮮亮麗的都市形象，這樣的文化與象徵背後的打造過程是我所要討論的。

本篇報告想探索的問題為：

1. 是哪些因素與發展過程，使得東區商圈成為今日承載了高級、流行與時尚等意涵的消費空間？國家、房地產開發商、商家在打造東區商圈的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而大眾傳播媒體如何參與這樣的過程？
2. 在這些象徵意涵之下，東區商圈中不同的消費模式是如何並置？哪些社會條件造成這樣的並存情形？這些異質的消費模式如何共享了高品味、流行、時尚等意象？他們如何共同建構這樣的空間文化？

### (五) 宜居城市探討

林依陵

人口向城市集中已經是全球趨勢，這個現象在亞洲城市更是顯著。由於全球化、城市化的推進及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快速發展的亞洲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在亞洲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也因此面臨許多環境與社會矛盾激化的問題。在環境方面，雖然城市規劃的最終目標是使其適居性增高，但往往以犧牲生態環境的方式來達到舒適生活；在社會矛盾激化方面，城鄉差距逐漸拉大、空間的社會隔離增高，甚至，因為全球移動快速，城市內部同時存在著來自國際的高階經理人與因應而生的低階勞工。當城市湧進這麼多的人口，並以舒適生活為名對土地進行開發的同時，她如何在環境上、社會問題上維持宜居性（livability）？居住其中的市民又怎麼看待「宜居」呢？

本文希望藉由案例，探討從 5W 看什麼是宜居城市（who—對哪些市民宜居、where—哪裡才是「宜居」、what—包含哪些材料使得城市宜居、when—何時才能達到真正宜居性、how—如何評斷宜居性），一方面以找出城市中的生活感與公共性，一方面以看出城市如何與全球環境共存。

### (六) 被遺忘的一角：外籍看護工與依賴者互動關係初探

曾惠君

2009 年以前有非常多的學術論述在討論外籍移工的議題，研究著重於外籍移工在工作國家的工作條件與社會關係（林津如，2000；曾熾芬，2004；藍佩嘉，2008；潘淑滿，2008）。但是在台灣，我們在公園或是早上的市場，除了看到外籍移工在買菜，進行家務工作，或是在公園聽音樂與聊天的休閒活動外，我們同時也看到老年人、身心障礙者、殘障者，外籍移工不是單獨出現的群體，外籍移工與老年人、身心障礙者、殘障者同時出現的景觀，才是一個整體。

學術論述缺乏老年人、身心障礙者、殘障者（以下統稱為依賴者）的聲音，看不見這個問題對社會是有危機的，而將外籍移工的社會關係簡化為只有雇主與

外籍移工兩者也是不足的，常常我們在公共空間中看到依賴者與外籍移工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但是依賴者卻可能不是真實付費的雇主，依賴者與外籍移工的關係是否可以放入雇主的「劃界工作」(藍佩嘉，2008)，本研究認為是需要再考量與研究的，而在討論外籍移工的社會關係時，若空缺了依賴者這個重要的角色，是不是會遺漏我們對外籍移工在社會關係中的認識？

外籍移工進入台灣工作填補了女性的看不見的工作，例如藍佩嘉所言外包的孝道，作者非常認同這是全球化下女性移工清楚的議題，例如在求存迴路(Survival Circuit)中外籍移工會因為制度遭遇很多的壓迫與不人道的待遇(Saskia Sassen, 2002)，但是若只有看到全球化資本主導的垂直結構半邊問題是不足夠的，因為問題的源頭是國內的照顧服務體系、社區服務設施和補助機制尚未建立起來，但當社會有需求，無法得到適當的服務，只好引進外籍看護工。故論述不僅要維護外籍移工的主體性、批判目前外籍移工工作條件的問題之外，同時也應該處理社會老年化，依賴者愈來愈多衍伸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遺忘了全球資本帶來的另一面結構問題，或視老人為生命政治下不重要的對象(生命即將結束，沒有生產力)，那這個問題就會一直存在，它不會因為外籍移工在工作國家中獲得平等的權益後，問題就消失。觀察基地選定為大安森林公園，大安森林公園是台北市重要的都會公園。依土地使用分區圖來看，四周圍繞住宅區，當地民眾步行可達大安森林公園，是外籍看護工與依賴者黃昏時間休息的最佳場所，如建國南路以東的大安國宅。大安國宅是台北市政府國宅處於 1984 年完工啓用的國民住宅，位於信義路以南，和平東路以北的區域，為完整眷村整建的基地，當地住有許多眷村時期或後進搬遷進來的家庭與老年人。觀察時段分別為 5 月至七月間的數日，下午三點到六點間。下午時段的優點是，可以清楚地以旁觀者角度看見外籍看護與老人的互動關係，而此時段的觀察，僅選定大安森林公園這個特定的區域，雖然有其對外籍看護與依賴者間關係理解的侷限，但使用深度描寫的要點，企圖以文字與圖象重現田野，仍可以讓研究者看到互動關係的蛛絲馬跡，希望藉此觀察做為起點，經過每一次不同觀察的田野筆記，本研究選取大安森林公園內 15 對外籍看護工與依賴者，對外籍看護工與依賴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客觀詮釋，並於報告中輔以照片佐證，另外，針對特定的外籍看護工行為或是依賴者行為，列為其他觀察詮釋的項目。

### (七) 從觀看 BDSM 文化與實踐：勾勒日常生活愉虐地圖

王琪君

研究者在 2006 年暑假開始親身實踐 SM 活動與書寫，歷經半年多的愉虐關係後與當時的「女主」一起邁向所謂的正常異性戀交往關係(也就是幾乎不再從事 SM 調教與支配遊戲)，這份親密關係於 2008 年暑假終告結束。總之，這個看似浪漫又奇異的過程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情慾／人際／社會 BDSM 文化是個爭議不斷的情慾實踐方式，外在法律規範視為必須管制禁止的色情形式。虐戀雖位居性少數文化中的一支分流，但當皮繩愉虐邦集結參與往年同志大遊行，曾招致

其他同志團體質疑為何要將同志遊行與 SM 綁在一起，擔心設為大眾以為同志都很愛玩 SM。在 SM 同好的網路討論區中，也常因網友們定義「扮演主奴應有的關係或角色倫理」的意見歧異引發辯論。

因此，或許如此可以界定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當身體欲求一份「特別的」快感時，那麼慾望應如何放入整體台灣社會脈絡考察？慾望如何被滿足與再生產？慾望如何面對外在規範約束？我認為應從 SM 虐戀實踐者的日常生活面向進入，虐戀主體如何以身體與空間互動，從何種管道接受資訊與使用物質，如何認知與實踐自己的慾望，從協商與妥協過程創造自己的身份認同，製造不同版本的虐戀倫理。關係與認同。

本文的研究架構將從兩方面論述，首先提出一個觀看色情文化的文化批評方式，耙梳並整理當代 BDSM 文化發展至今所累積的實踐內涵，深化其可能蘊含的改革能量，也就是「變態」與「逾越」之必要。第二部分則觀察目前台灣社會的各類 BDSM 資訊、文化傳播與主體實踐方式，進入日常生活真實場景，開啓慾望個體／群體與社會政治經濟層面對話之可能，以性地理學的視角勾勒本地 BDSM 愉虐戀的情慾地圖樣貌。

#### (八) 台灣女子體育運動之發展與棒球場域的女性身影

吳世政

地理學中研究運動現象的系統分科—運動地理學，近來亦遭受女性主義思想批判，開始關注女性參與運動之情形 (Ross, 2008)。而國內，以地理學視角關注女性參與體育運動情形之作品，則尚未出現；其實在廣泛的人文社會學界，關注女性體育運動之作品亦屬鳳毛麟角；因而本文希冀以地理學視角開拓女子體育論述，尤其針對台灣棒球場域的女性身影加以論述。本文發現，現代運動是日本殖民政府有計畫傳入，亦是改造當時台灣女性身體的重要憑藉，使得當時的台灣女性得以由家空間中走出，開拓生活空間，創造不同的人生際遇與經歷。但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尚未出現在野球場中，野球和許多現代運動一樣，被作為中上階層的社交活動，因而能出現在野球場上的都是中上階層的日本女性；但這些中上階層日本女性在野球場空間中之存在仍是姓名不詳、面貌模糊之狀態。國民政府接掌台灣後，首要的體育施政在恢復場地和推行國民體育；但都是以配合復國準備為主，因而發展有限；而女子體育在如此時代背景下，亦擔當起保國強種和維持女性陰柔體態之重任，體育運動的工具主義傾向明顯。而棒球運動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中亦被刻意營造成「棒球奇蹟」，出現在棒球場域中的女性是擔任幫襯「三冠王棒球英雄」的配角角色，雖然有了清晰的容貌，但仍然是客體化的存在。而更有甚者，女性也被動員走上棒球場域，進行台灣史無前例的「全國女子少棒賽」；但由於是動員未成年無自主意識的少女，所以並無持續之可能，這段女子棒球的燦爛過往，旋即湮沒在歷史長河中。1978 年，台灣社會解嚴後，趨於多元發展，體育運動所扮演之角色越來越重要，因而體育運動政策與體育運動科層體制逐步成形；加以性別意識之崛起，並推行於學校體系，以及落實於法律體制



中，越來越多的女性得以在成年後的自由意願選擇下參與體育運動；而女子棒球就是其中發展良好的運動種類之一，有固定的球隊、組織、賽會，甚至代表國家出國參賽；而其實最重要的是，勇敢踏進棒球場與，參與女子棒球的女性們，可以發揮女性潛能，跨越傳統刻板的性別界線，創造屬於自己的棒球空間，並在其中找到自尊與自信；而這也堪稱女性身體以及意識之解放的良好範例。

#### (九) 共生：以口述歷史取徑探討北市華光社區異質性社群的日常生活經驗

蔡敏真

從台北市區域發展過程中來看，台北市華光社區周遭時空演變從舊有威權統治到企業型城市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造城，台北看守所、台北監獄歷經日據與民國，之後又轉化成中華電信與中華郵政大樓用地。與其對面的中正紀念堂等國族收編的相對性主導空間。以社區內部的空間形式來看，從日式平房、公有宿舍做為原有地上物形成背景，隨著圍牆邊界的推移過程，漸漸地形成眷舍與違建混合的社區。異質性社群共生的生活網絡與整個城市發展脈絡息息相關，台灣的離散文化(Diaspora Cultural)形塑台北城風貌，不間斷地填充華光社區組成。從民國初期撥遷來台的外省移民，含軍人、公務員，過程中城鄉移民的持續遷入，到近期外籍配偶、移工鑲嵌拼盤。顯示出社區內部不僅僅是不同階級一同成長、生活，居民們也經驗了多重的現代性並與其共存、共生。

研究焦點於社區的空間實踐與歷史記憶，梳理出居民特有階級、歷史、網絡的日常生活經驗。不同於一般眷村，鄰近台北市中正紀念堂的華光社區為法務部公務員宿舍區，早期由於經濟壓力與家庭人口增加，公務員在院子裡進行搭建、延伸，給與較低層的公務員與家庭成員出租、居住，呈現互助的社會精神。後來，又因城鄉移民潮，新一波人口進駐，搭建轉賣的情形增加。解決早期居住空間的需求，也呈現出雜亂的景觀。

取徑採質性研究的口述歷史與參與式觀察進行田野調查。在記錄拆遷過程中進行對話、感覺詮釋，引出特定情境的脈絡結構，從社區圖像形構空間的故事。闡述，不僅是恢復過去歷史，對記憶的說法裡也蘊含個人認同、行為、選擇、扭曲與社會結構的關係，在生命細節的詮釋性裡反映出動態的「歷史」。試圖將從多元敘事實穿全文描繪出社區多層次的空間認知地圖。本研究從居民的角度往上看新自由主義霸權對他們的無形影響，所產生的社會排除與迫遷抵抗，也為他們的生活經驗做記錄。

#### (十) 爬出畫框的濕淋女體：倫敦城市畫廊中的汙物及女性身體控管

邵可霓

奧菲莉雅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哈姆雷特》中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薄命戀人。比起其他悲劇中同樣很早就香消玉殞的茱麗葉、戴斯提夢娜、及菟蒂莉亞，雖然她的存在感薄弱，「戲開演後你幾乎看不到她」<sup>2</sup>，對英國及法國畫家來說她卻是繪畫主題中最常出現的：她那一身白衣、金髮綴滿野花、天仙般恍惚夢幻的

表情儼然成了學院繪畫或大眾文化間「為愛而瘋的純潔少女」典型。《哈姆雷特》中，她是女性細緻貞靜之美的代表，柔弱的可人兒為情所縛、為愛所苦，對王子的表情無處可訴，最後落水成了柳下花間的河中亡魂。在羅帝絲的《奧菲莉雅與維多利亞時期視覺藝術文化》一書附錄中，在她研究的 1890-1901 年間總共有 55 幅奧菲莉雅的畫作在倫敦的皇家學院展出；但在二十世紀前 50 年間出品的便占了 41 幅<sup>3</sup>。簡直像是畫家對奧菲莉雅的迷戀在英國經濟最繁盛與帝國事業擴張最極致的維多利亞中期猛然爆發出來一樣，50 年間有 41 幅奧菲莉雅「大量出品」，而這些還只是被最主流的藝術機構——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所認可的畫作而已。米雷（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1852 年的《奧菲莉雅》（圖表 1）可說是開了奧菲莉雅唯美崇拜之先河的首席畫家。他用珠寶般的透明色彩、明亮纖細的寫實手法妝飾奧菲莉雅飄盪在水面上的禮服及抱擁她的大自然花木，此絕美畫作展出，轟動一時，毀譽參半，因為他挑戰傳統的描繪角度而引起諸多讚美與輿論（Rhodes 87）：在羅帝絲列出的 41 幅維多利亞中期與後期的奧菲莉雅中，主題可分為奧菲莉雅生命中的兩景：瘋狂及落水。根據羅帝絲及蕭渥特所言，落水一景為米雷率先開啓的傳統外繪畫觀點，之前的畫家所畫的奧菲莉雅均為戲劇的插畫或是戲劇演出女角的重現；因為她的死並不會在台上發生在觀眾面前（off-stage death），而是由皇后葛楚德口述，因而當米雷照著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台詞，發揮畫家的想像力、做了敘述一景的獨立精確重現時，很多人認為以毫不感傷（sentimental）的銳利筆觸精準重現死亡的畫家「病態」、「操守可議」、「冷酷無情」；他畫的奧菲莉雅則是「不貞」、「頹廢」、「悖離常軌」的（Rhodes 52-53）。

在閱讀許多城市空間研究文獻及拉斐爾前派畫作之後，我想探討的是，在現代化改革與藝術變革之間，該如何釐清藝術在父系歷史社會進程中的意義？為何 250 年後的畫家會如此執著於奧菲莉雅輕盈透明的青春女體？米雷的拉斐爾前派《奧菲莉雅》，與開始奧菲莉雅迷戀的維多利亞中期有什麼關係？在男性的藝術傳統下<sup>5</sup>，奧菲莉雅的諸多再現——以米雷為例——又具有怎樣的歷史性與意識型態意義呢？如果如蕭渥特在她著名的〈再現奧菲莉雅：女人，瘋狂，與女性主義批評之責任〉一文中所說，奧菲莉雅的故事對女性主義者來說並非單一情節的悲劇、並非男性壓抑與欠缺下的悲劇另一面、而是「一段再現的歷史」（Showalter 223），在傳統性別概念面臨再定義危機的時代主流與女性主義批評間的意識形態爭議最容易浮現，且「並沒有女性主義者必須清晰描述的一個『真實』奧菲莉雅；只有立體主義般多面向的她」（238），那米雷的畫在這英國因為工業化蒸蒸日上的時期展露的是當代性別概念的什麼面向呢？何以評論家會認為乍看之下乾淨安寧的漂浮著在生之幻境的奧菲莉雅「不貞」、「悖離常軌」、「頹廢」？為何評估藝術價值時把它當作道德上的「異數」來看呢？歷史上許多主流評論家與現代女性主義評論家間對於奧菲莉雅真實樣貌的拉扯其實反映了維多利亞時期影響後代甚鉅的迷思，也就是對女性的兩極化看法。「奧菲莉雅的完璧與性魅力不可能共存」，因此當米雷處理她的態度有著明顯的矛盾，當人們看出畫中複雜曖昧的

象徵意義，他們只能選擇用道德論述及當代盛行的科學工具化語言來閱讀、理解／肢解／解釋她。我認為從當代評論家的說詞中可以發現當時的社會改革衛生論述與藝評家在描述畫中女性形象在語彙上有類似的男性焦慮；在工業化使階級貧富分化、達爾文進化論挑戰宗教根基、生物學天文學的演進顛覆人們世界觀的同時，維多利亞人因此總是試著解釋、試著控管、試著用也讓他們混亂的現代化科學化字彙來妥協衝突，好在不定的時代中抓住一絲可以倚靠的信念。能妥善乾淨的行其所當為（propriety）及將周遭事物管理在可以理解的框框中因此格外重要，因此道德物質上無法控制的暴亂髒汙也更為令人痛恨。我認為奧菲莉雅在詮釋上的複雜性讓當代人無法明確且二分的定義她的本質，因而在畫家展出畫作後以二分的意見，讓她成為對當代少女而言可親也具警告性的正負面道德教材。父權秩序在將女性與自然做連結，將女人天性本質化的同時，也因無法理解自己這樣建構出的善變女性而感到焦慮；在藝術上，對神祕女體的管理與唯美呈現一直是拉斐爾前派畫家熱衷的主題，畫中的女性本質被妥善管理複製一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排除不該出現在日光下的非理性空間與文明發展的殘餘。將她們的自主空間與主體一併抹除、或將她們美化到自己可以輕鬆慾望的地步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除此之外，拉斐爾前派在羅斯金的背書下本來就是反映當代「消毒明亮衛生美學」的前衛派。我認為社會對城市身體與他者身體的管理一如畫家精心為奧菲莉雅繪製的牢籠與框架，除了她被純粹化的正負面教育價值之外不希望有任何複雜性溢出他們給的框架外，接下來便要試著論述奧菲莉雅畫中的這種複雜性。

#### (十一) 宅女想像／想像宅女：艾蜜莉·狄瑾森的文化空間

蔡幸怡

1830年艾蜜莉·狄瑾森出生於麻州的安赫斯特(Amherst, Massachusetts)，自1858年開始，逐漸進入隱居生活，辭退任何與外人會面機會。1869年書信中曾言「我從不跨越我父親的土地，從不到其他房屋或城鎮」。狄瑾森刻意避世隱居，於日常行動上將十九世紀時，男女隸屬於劃分的公私場域的意識形態徹底執行。在某方面，她極端執行維多利亞時期理想化的女性「家中的天使」一足不出戶，身著白衫，漫步溫室花園，留心家務照護家人—反而鬆動當時男女公私場域劃分的意識形態，引起外界好奇窺視的眼光，成為公眾中矚目的焦點。

狄瑾森的避世與矛盾的公眾性，與「性別」極度相關。性別的差異影響人們如何想像與描繪「隱士」。例如，較狄瑾森稍早的重要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梭羅於1845年到47年，隱居瓦爾登湖(Walden Pond)畔兩年，寫出《湖濱散記》。梭羅的短期隱居，雖然無法與狄瑾森的終生避世相提並論，然而在此處將兩人並置，能看出「性別」與「隱居」的文化想像關係。即便梭羅在湖濱過著與公眾切割的簡樸生活，他的隱居仍然充滿社會與政治性的宣示。依照他在《湖濱散記》所記述，他隱居時仍然像個隱性的社會運動人士，就像是「清晨努力嘹亮放嗓的雄雞，站立於雞舍，只為了喚醒我的鄰人」。雄雞的意象十足

男性陽剛。梭羅以他的政治立場，批判社會物質化與資本主義，即便是在樹林中，在最遁世隱蔽的場域，「他」所代表的一切，仍然都與社會或政治關懷息息相關。身為集體文化想像中「成功的男隱士」，主體性、自主選擇權不容置疑。隱居的動機與意圖更是以陽剛化形象呈現，成功地避免「去陽剛」或「陰性化」的退縮想像。

從一方面來講，「性別」是瞭解人們對於「隱世/隱士」的想像、迷思或焦慮的重要指標。十九世紀公私場域依性別劃分的意識型態盛行，因此在當時如何定義或運用「公」或「私」這兩個詞彙，實際上早已被意識形態所控而僵固化。隨後拜女性主義批評所賜，此種因為意識型態造成的以性別之名而僵硬或偏見的現象，或者，試圖將文化歷史現象，自然化或合理化的不平等，才得以被點破並解構。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講，矛盾的是，女性主義批評的走向，竟然又走入將女詩人或女隱士去歷史化，當投注於解構父權社會時，卻又再度隱化女性創作者。

要跳脫於此評論僵局，不僅須回歸歷史本身，還可從「空間」的角度探討，再創造新的討論向度。我在此處指的空間，並不是指文學研究傳統中，所指的狄瑾森文本內的獨創詩意空間，或者女詩人的詩空間。我所指的空間向度，試圖將社會文化的變動向度，涵括進入討論範圍。因此我要探討的主題可分為兩面向。我認為，檢視這兩面向，是如何都潛移默化得各自創造或再衍生文化論述，有意無意將狄瑾森抹去政治與歷史痕跡，留下一張乾淨的女詩人臉，藉以呈現在當代大眾文化中。此張女詩人的臉孔，不僅是以文學之名的純粹性擦拭抹粉，而顯得乾淨單面向的臉，也是於政治正確中逐漸削角去稜，使得討論的歧義面向遭到簡化、視而不見、或者即便現身也不被承認的臉。將分別說明分別為：第一，十九世紀的流動空間；第二，當代博物館展示的美學空間，與其大眾商品化之後的交纏，所創造出來的想像空間。在拉出時間軸後，試圖串連狄瑾森所處的十九世紀美國與當代，將狄瑾森放入歷史脈絡，並探討當代大眾文化想像中，是如何創造出女詩人面孔；或者，理解人們是如何去想像一位十九世紀的「宅女」：當十九世紀歷史舞台背景中，「宅女」欠缺了網路遊戲、漫畫或影視的聲光科技娛樂陪襯時，在這般的「宅空間」裡頭，演化或衍化以及如何幻化了什麼樣的文化想像，加諸這位「十九世紀最重要的美國女詩人」身上。

## (十二) 全球化的觀光旅遊轉型—沙發客經驗初探

陳德容

全球化帶動了觀光產業的發展與旅遊景點的生產，而當觀光旅遊發展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也逐漸成為全球化的流動中重要的一股力量。這群主要的流動族群為中產階級觀光客。反觀全球化的研究，早期以流動的跨國資本與主要掌控的菁英階級的研究為主，而後由 Sassen 等學者論述跨國勞動力在全球化的位置以及其處境，成為另一股全球化研究的趨勢。然而對於中產階級透過國際觀光旅遊的方式在全球的流動則少有討論；近年來 MacCannell、Urry 等學者的研究開

始關注全球化的觀光現象，並帶入社會學視角的討論，但仍將觀光旅遊視為一產業，或將觀光旅遊視為一社會行爲，而並未將觀光旅遊拉到全球化流動的層次討論，國際觀光客在全球化流動中的角色位置也並未受到重視。

以觀光旅遊的現況發展而言，當觀光旅遊以進入一民主化的過程——這意味觀光旅遊已從只屬於某些社會階層的活動，發展成大眾休閒文化；到十九世紀後半，當大眾運輸已發展至一定規模時，人們地位的差異已不在是有沒有能力旅行，而是表現在旅遊時的等級區別(Urry, 2007)。而隨著旅遊的民主化，品味的差異展現在旅遊地點的不同，同時也展現在旅遊方式的選擇上。這樣的趨勢同時也回應觀光旅遊產業進入後福特制(Post-Fordism)的消費型態，其主要特徵是從大眾消費型態進入小眾的、個人化的轉變，許多特殊型態的旅遊方式接應而生：文化深度旅遊、生態旅遊、背包客旅遊都由此發展。Ateljevic 和 Wilson(2007)指出個人化觀光型態反映出旅遊經驗的多樣性。觀光客和當地，已不再如 Urry 所言僅存在一種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反之，觀光客與當地的互動之中，其實存在許多曖昧與妥協的過程。

沙發客旅遊(Couchsurfing)是近年來興起的小眾的特殊形態旅遊之一；沙發客們透過網路社群的連結，在世界各地旅遊時可以尋求其他沙發客的家中借宿。由於這樣的連結，沙發客旅遊發展成爲一種觀光客與在地人之間的文化交換。這樣的旅遊形態支持 Ateljevic 和 Wilson 的論點，在地人接待外來沙發客的過程之中，當地人化爲地方的再現，而彼此之間的互動更具體的呈現了 Ateljevic 和 Wilson 所謂的觀看與被觀看權力之外、觀光客與在地的妥協過程。

此外，參與在沙發客網絡社群中的多爲 Bourdieu(1984)所謂的小資產階級(new petite bourgeoisie)，其特徵在於並無龐大的經濟資本，亦不若國際移工販賣勞力，唯一擁有的即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資本力量，包括其網絡連結與資訊傳遞的能力。立基於此，本研究欲從沙發客旅遊的經驗出發，並不試圖將觀光旅遊單純作爲一消費行爲來理解，而欲探究沙發客作爲一全球流動的觀光客，透過與當地之間文化交換的經驗，已及透過此過程的反思之後，對自我、地方城市、觀光旅遊產業、乃至於世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力量。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分析，以沙發客網站(<http://www.couchsurfing.org/>)上沙發客網站上的發言作爲研究分析基礎。

### **(十三) Street Haunting, Book Reading, and Life Writing: Virginia Woolf's Philosophy of Flânerie**

林嘉瑩

“‘I love walking in London,’ said Mrs Dalloway. ‘Really, it’s better than walking in the country.’” (Woolf, Mrs Dalloway 5). Plunging into the streets of London in an early morning of June 1923, Clarissa Dalloway’s walk thus unfold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London novels, herself being one of the most well known female strollers of this fascinating city. The same affectionate words do not belong

exclusively to Clarissa—one can hear them resounding almost everywhere in Woolf's novels, short stories, essays, diaries, and letters. In a 1925 diary entry, she writes: "I like this London life in early summer—the street sauntering & square haunting" (Diary 3: 11). After nearly ten years of living in Richmond, Woolf has found the stir of urban life and the excitement of street rambling rejuvenating to her sensitivity,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s a writer. London, life, walking, women, and writing—all of these are subjects dear to Virginia Woolf, and their interconnectedness is proven time and again central to the studies of her oeuvre.

Real or imaginary, walking has always been a pivotal motif and trope in Woolf's writing, especially in two of her most prominent feminist polemics. In *A Room of One's Own* (1929), the female narrator has taken a walk through the fictional Oxbridge University, searching the campus lawns and the library shelves, to realize women's forced absence and marginalized position in the male-dominated world of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In *Three Guineas* (1939), the female narrator has too gone for an imaginary stroll in London, observing the awe-inspiring buildings as well as the ostentatious pageantry of men clad in insignias, to recognize the concentration of authority in the supposedly "democratized" society and men's aspiration for fame and competition for power as the root of fascism.

For Woolf, therefore, walk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or, the act of *flânerie*—is more than a physical activity through which the writer-flâneur's field of vision is enlarged and her artistic imagination invigorated. It is also a metaphor for the logical movement from one observation to another, a means for Woolf to, in her own words, "pull down the imposing curtain [in a writer's mind] which hides the critical process until it is complete" and to show the reader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every critic has reached what he/she "chooses to call 'a conclusion'" (Essays 4: 450). Woolf's image of a writer-flâneuse strolling, stray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direction (in the streets as well as in the mind) reshapes that of a typical and much criticized writer-flâneur, which is envisaged not as "a body within the city" but as "a totalizing, panoramic, and authoritative viewpoint, of being an eye observing it" (Parsons 36; emphases original). It is more than an inversion of the flâneur's gender, as many feminist critics tend to emphasize. It is a re-definition of the flâneur's role and gaze, along with a re-vision of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is particular mode of observation, be they social criticisms, news stories, physiognomies, the *feuilletons*, or fictions and biographies. By moving the observing eye/I from the remote window back into the crowded streets and having her describe the turns and the detours she is enticed to take, the blinds and the dead-ends she is confronted with, and the incomprehensible faces and the incomplete conversations out of which she is to fabricate a story, Woolf not only demystifies the figure of flâneur as a disembodied

and thus omnipresent and omniscient urban commentator but also formulates a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ough perhaps unwittingly, her own feminist project of life reading and life writing.

#### (十四) 空間化的歷史：論阿蘭達蒂·洛伊的《微物之神》

楊璐綺

*歷史是一個建築工程的對象。工程的場地並不是同質的空洞時間，而是充滿了當下時間的時間 (Walter Benjamin, SW4: 395)*

南印度小鎮燠熱的夏季空氣中，瀰漫著過熱的氣息和沈重的期待。六月，季風來臨，允諾的雨水降下，昏沈的小生物一下子醒了，猛烈的雨水翻起泥土，也翻動埋藏多年的沈重秘密。雨中，一個女子回來了。

這是印度作家阿蘭達蒂·洛伊 (Arundhati Roy) 的獲獎小說《微物之神》的開頭。洛伊以自己生長的家鄉為題材，寫出橫跨印度殖民前後的複雜故事，故事的中心圍繞小鎮的一戶中產階級望族，但故事的結構卻交疊纏繞。所有的主要事件都在第一章裡留下痕跡，但這些事件的關連卻緩慢地在接下來的二十章裡迂迴推進，直到最後一章才點出關鍵性的一刻（雖然透過暗示的堆疊，讀者也早已預知）。洛伊捨棄傳統的線性敘事手法，取代以一則則色澤鮮麗形象生動的記憶碎片，碎片與碎片之間互有交疊和斷裂。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彷彿不斷被提起些什麼，卻又不斷被拒絕些什麼。故事中充斥的象徵逐漸在讀者腦中形成一幅記憶拼圖，隨著篇章的推進，讀者逐步將這些象徵擺放到它們所屬的位置。藉由這樣的敘事手法，儘管小說的情節是望族三代的興衰史，小說的敘述讀來卻更接近對空間的探索與重新建構。

在討論《微物之神》獨特的敘事方式時，瑪杜·賓諾 (Madhu Benoit) 以「環形時間」(circular time) 的角度切入。賓諾認為，在小說中，「時間被層層重疊，每一層都留下了無法忘卻的痕跡，混淆整體感知。因此過去一直在現在當中，現在也一直在型塑未來」(98)。她提出小說中有兩條故事主線：(恐怖) 事前和事後。這兩條主線是時間性的，水平發展，各自形成完整的故事。在這之外另有第三個整體，即以文化符碼形式出現的歷史，或者以洛伊的詞彙來說，「愛的律法」。這條主線是非時間性的，垂直貫穿支配兩條時間性主線中的發展。賓諾將時間性與非時間性交互作用的模式稱為「雙重時間模式」(99)。時間性主軸構成了故事的主體，而環繞在主體旁各自生成了不同角色的獨立生命故事。這些獨立故事雖不屬於故事的主體，卻提供了瞭解故事主體的必要資訊。洛伊在不同的獨立故事當中跳接，創造出好幾個正在進行中的時間層次，讀者因而在「前因」和「後果」間來回旋繞，形成了交互疊套的環形時間，而在環形時間的背後，愛的律法以超越時間的姿態監控著。

弗里德曼認為小說是以空間為主軸，將發生在時間線上的事件具體呈現出來。空間包含了時間，歷史空間化。弗里德曼將小說中不同空間邊界的建立與跨越當作一則政治諷喻，代表印度這個民族國家的各種邊界，包括對外和殖民者的疆界、以及對內由性別和種姓制度所建立的疆界。空間首先形成了疆界，產生各種社會文化的身份和限制，卻也同時留下了跨越疆界的可能。弗里德曼並且援用了傅科的「異托邦」概念來解讀這本小說。

弗里德曼的讀法掌握了《微物之神》書中濃厚的空間感，彌補賓諾環形時間觀中把跨時間符碼簡化和抽象化的缺憾。然而，在以詮釋小說中實際的空間時，弗里德曼卻只個別談論故事中幾個重要的空間，包括阿卡拉舍（歷史之屋）、阿耶門連殿（阿耶門連老房子）、阿比拉什有聲電影院（阿布希拉許戲院）、樂園泡菜醃菜廠（天堂果菜醃製廠）、以及維魯沙的家，而忽略了這些空間彼此交互作用的關係。如此一來，小說錯綜並置的空間化手法便被抽離開來，這些空間作為「異托邦」以抗衡主流空間的意義也被削弱了。

因此，本文將從弗里德曼所援引的異托邦概念出發，但以更貼近文本脈絡的方式進行分析。藉由追溯空間與空間之間的關係，本文不僅將探討踰越行爲的發生，更將探討這些踰越行爲何以在這些空間發生，而這些踰越行爲又對其所關連的空間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 五、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本課程設定的目標為透過性別、都市與文化來理解當代全球化的複雜現象。首先借重課程安排的學者深入淺出的精采演講(摘要見導讀)，讓來自地理所、城鄉建築、戲劇、國際企業、外文等不同領域的同學們得以藉由國內外跨領域講者的視野，從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學、文化研究等學門來思考讀本設定的議題。除了導讀之外，幾位學者同時引介個人的新興研究與研究方法並與同學對談，對同學們如何進行研究發問與開展研究方法皆有深遠的啟發。再者，本人任課時每堂課皆要求同學在課堂前繳交閱讀心得(詳見議題討論)，並將心得上傳課程網站提供全班閱讀，隔日上課討論時間便先開放討論，讓同學互評彼此的心得，之後再進一步進行當週的指定教材口頭報告，如此可確定所有的閱讀內容皆有具體豐富的討論。除了理論的引導與解讀，本人亦強調教授學生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與視角，特別注重訓練大家如何詮釋與分析再現文本(以影片為主)的意象與象徵。總體而言，多元開放的上課方式使大家都能充分參與，彼此對話，課堂的討論因此始終踴躍熱烈。從同學的期末報告也可發現修課的學習成果，大致來說，修課同學皆能以本學期的閱讀為基礎，思考與個人研究相關的議題，完成的論文(摘要詳見研讀成果)反映了大家在思考向度的拓展、論述問題的闡釋、以及視覺文本的分析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因此，計畫主持人自評課程目標已圓